

中国出版

● 主编 宋原放 ●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

ZHONGGUO CHUBAN SHILIAO

现代部分

史料

补卷 中册

● 吴道弘 辑注

山东教育出版社
湖北教育出版社

中国出版史料

主 编 宋原放

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

现代部分

● 补卷 中册 ●

(一九三七年七月—一九四九年九月)

● 吴道弘 辑注

山东教育出版社
湖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中 册

- 二八后出版界的倾向 杨寿清 (307)
- 琐忆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出版事业 范 用 (322)
- 一九三八年,上海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 丁景唐 (327)
- 新知书店在“孤岛”的出版工作和海上运输线
..... 俞筱尧 (333)
- 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 (350)
- 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出版经过 魏龙泉 (382)
- 斯诺的陕北之行及其著作的流传 蒋建农 (392)
- 四十年代上海的鲁迅研究工作 丁景唐 (403)
- 刊物消毒 朱光潜 (427)
- 韬奋同志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徐雪寒 (432)
- 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(1941年4月) 徐伯昕 (438)
- 解放前上海生活书店的活动纪实 许觉民 (451)
- 我在生活书店的工作是——为读者找到书 周保昌 (473)
- 忆苏中报社和苏中出版社 宋原放 (479)
- 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 吉少甫 (485)
- 记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 田一文 李济生 (497)

海燕十三年(选载)	俞鸿模 (505)
亚光舆地学社简史	葛方文 (559)
回忆亚美书店	徐 达 (568)
少年出版社片断回忆	丁 裕 (580)
早期群益琐忆	屈 楚 (589)
我和耕耘出版社	黄宝珣 (603)
略谈万叶书店	钱君匋 (614)
回忆战时《中学生》	王知伊 (619)
闪耀在“孤岛”上的一把火炬——《上海周报》	丁 裕 (631)
记范泉主编的《文艺春秋》	钦 鸿 (644)
文化动态的集锦——记《上海文化》月刊	王揆生 (681)
胡风主编的几个刊物	徐霖恩 (693)
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副刊	李春燕 (702)
《东北文学》发刊前后	韦长明 (717)
我的编译生涯	张仲实 (728)
《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》和有关的情况	周文熙 (734)
延安时期图书简目(1937—1948)	(737)
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缘起	赵家璧 (769)
《世界知识年鉴》序(1936年3月)	(772)
《中华年鉴》编辑凡例(1948年元月)	(774)

一·二八后出版界的倾向^①

杨寿清

申报馆的出版事业

民国二十年（一九三一年）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沈阳事变，接着于翌年（一九三二年）一月二十八日又爆发了淞沪之役，使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出版界，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尤其是商务印书馆，设于闸北的总厂、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，都毁于炮火，总计全部损失共达一百五十余万元（其时米价约每石十元），于是一方整顿内部，一方解雇职工，致其出版事业一时陷于停顿。^②

其他各书局的厂址多不在战区，故有形之损失尚微；但因战事发生后，职工大部均被遣散返乡，停业达一个月左右，其营业上的损失亦不为小。迨停战开市后，又因读者受购买力的限制，除教科书外，其他书籍销数极少。而且大部分的印刷所与装订作是设在闸北的，因此有不少正在排印和装订的原稿和书籍都毁于炮火，这种损失亦颇可观。

不过，中国的出版界终于又在烽火之后苏醒过来了，而最先负起复兴中国文化的责任者，则是申报馆。

当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，曾罗致不少文化人，进行出版计

划。^③聘请原任商务“东方杂志”的编辑同人俞仲华与黄幼雄等主持出版“申报月刊”以代替停刊了的“东方杂志”该刊各类文章，大都由第一流作家执笔，所以内容精彩，风行全国，尤以翁照垣的“淞沪血战回忆录”，是一篇为全国读者所爱读的报告文学。另由张梓生等主编申报年鉴；由丁文江、翁文灏、曾世英编纂“中国分省新图”，以纪念该报的六十周年。在此以前，中国尚无完备详尽的年鉴，亦无正确精密的地图，如今申报馆出版这两种图书，便补救了这些缺陷。此外并出了好几种申报丛书。同时，申报的社评，更能切中时弊，敢于对政府的施策作严正的批判，故极警辟动人。该报副刊“自由谈”，则改请黎烈文主编，特约鲁迅、茅盾等诸名作家撰稿，发表辛辣的杂感，讽刺的小品，尤为社会人士所注意。此外，还办了若干社会文化事业，聘请李公朴主持“申报流通图书馆”，柳湜、艾思奇等主持“读书问答”，并创设“新闻函授学校”。加出种种门类的周刊附于报内。这一段历史，至今在出版界留着光彩的一页。不幸过了一年光景，史量才氏遭狙击逝世，于是申报在政治力的约束下，不得不敛其锋芒；该馆职员言论较为左倾者，都先后脱离；“申报月刊”改为“申报周刊”。内容也比较稳健了。

跟着，现代书局出版了“现代月刊”，^④由施蛰存主编，取代了商务印书馆以前所出“小说月报”的地位。因为这是当时唯一的文艺杂志，所以许多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交予该刊发表。后因杜衡、胡秋原等主张文艺自由论，而左翼作家则认为任何作品都受阶级性的限制，而引起了关于“文艺自由”的论战，所谓“第三种人”这个名词，便是在当时提出来指杜衡这班不左亦不右的人。

出版界的复兴与“杂志年”^⑤

一·二八战事和平解决以后，社会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状态，于是出版界也得到了复兴的机运。商务印书馆经整顿以后，即于民国二十年的八月恢复总发行所，把应市的教科书交由香港与北京两地的分厂排印，继复在上海重建制版厂和印刷厂，到同年十一月一日起，开始“日出一新书”，至二十三年起每日且增出二、三种，迄二十五年底，已出新书一千余种。又，该馆复业不久，即编印“复兴教科书”一套行销，以后又出“星期标准书”，每周提出较有价值的新书一、二种发售七折特价。本有的十一种杂志则复刊了五种，即：东方杂志（半月刊），教育杂志（月刊），儿童世界（半月刊），儿童画报（半月刊）和英语周刊。

中华书局在一·二八时，因知政府的法币政策势在必行，所以改变了营业方针，注重于印刷钞券，结果获利甚钜，其后又重振其出版事业，除继续出版“小朋友”等几种刊物以外，至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复发行综合性的“新中华”，再后又出“少年周刊”；并在书籍出版方面，与“商务印书馆”作剧烈的竞争。“北新书局”继续出版着“青年界”（月刊）与“小学生”（半月刊）；“现代书局”除出版“现代文艺月刊”外，并有“现代儿童”半月刊；“开明书店”除出“中学生”外。后复出版“新少年”，到事变以前更有“月报”的出版。全国各书局，都在努力着出版新书。

在这时期新开办的书店很多，其中最富有生气者，是邹韬奋主持的“生活书店”。邹氏在五·卅时代，便在教育界前辈黄炎培

等的扶翼下创办一种小型报“生活周刊”，文章大题小做，短小精悍，在全国风行。上至大学教授，下至商店学徒，几乎人手一篇，其全盛时代，每期销行达十五万五千份，这在中国的期刊中，是前古未有的销数。其后，办理“通信购书”业务，代各地读者购买图书。继将“生活周刊”上的文字选辑出书。一·二八后得前东北当局的巨额投资^⑥，乃扩大业务，成立书店，于民国二十三年秋迁至福州路。其时“生活”周刊已停，邹韬奋另编“大众生活”周刊，意识前进，针对现实，内容颇为精锐，其后被禁，复请杜重远编“新生”周刊，因其中有文妨害邦交，又被取缔，杜重远且因此入狱；^⑦接着又由金仲华主编“永生”周刊，寿命亦不长久；最后由邹韬奋主编“生活星期刊”，但出至二十六期以后又遭禁止。“生活书店”扩大营业后，先后出版了许多的刊物和书籍：请郑振铎与傅东华等主编“文学”月刊，当时为“现代”撰稿的诸名作家纷纷把作品交予“文学”发表，结果竟使“现代”黯然失色，终至停刊了。陈望道主编了一种比较左倾的散文小品半月刊“太白”，停刊后复由洪深与沈起予编辑一种富于现实性的综合文艺半月刊“光明”。沈兹九主编“妇女生活”，内容超过了过去“商务”的“妇女杂志”和“开明”的“新女性”，而成为新进妇女大众爱好的读物。张仲实、金仲华、钱俊瑞、钱亦石等主持“世界知识”半月刊，是专门探讨国际问题和时局动向的杂志，编制新颖活泼，而“时事图解”一种尤其出色^⑧，相当于日本的“世界知识”。“生活书店”在同时期中，出版有五、六种杂志，而且各有特色，销路广大，几可替代一·二八前“商务”的地位。该书店并努力出版新书，迎合时代潮流；尤以郑振铎主持的“世界文库”，搜集了国内外的许多名著；平心主编的“全国图书目录”^⑨是中国出版界从未有过的创举。由“生活书店”的成绩以观，实不愧为中国出版

界的后起之秀。

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说作家巴金，本名李芾甘、过去曾译述若克鲁泡特金的著作，五·卅以后，其长篇小说“灭亡”在“小说月报”上连载，博得青年的盛大欢迎，于是致力于文艺创作。到了这时期，他为“良友图书公司”主编了一种大型的“文学”季刊，但不久停刊。其后他和靳以等自办“文化生活出版社”^⑩，编印“文季月刊”，后改出“文丛”月刊，并出“文化生活丛书”，兼收创作和译本，内容颇为精湛，在文化界也有相当的地位。

此外还有“黎明书店”，起初出版伍蠡甫主编的“世界文学月刊”，约一年后停刊；至民国二十六年出版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主持的“文摘”月刊^⑪，选载国内外各期刊上的名文，该刊与“开明书店”的“月报”，都曾风行一时。“时代图书公司”出版了林语堂主编的“论语”半月刊，提倡幽默文学，鼓吹“健康的微笑”，在中国的文化界别开生面。不久，林语堂复主编“人间世”半月刊，由“良友图书公司”出版，这是中国第一种高级的纯粹散文小品的杂志。其后在林语堂这个系统下的，还有他与陶亢德合编的“宇宙风”，徐訏等编辑的纯文艺杂志“天地人”，简又文与谢兴尧主编的文史小品杂志“逸经”，黄嘉德、黄嘉音所办专载翻译欧美作品的“西风”，以及“谈风”“西北风”等的许多“风”字辈杂志。

“天马书店”曾出鲁迅、茅盾等自选集多种。“作者书社”创办的初旨，是谋作家与书商合作出书，但其后并无发展。“文华美术书店”为民国二十四年开办，出版“文华画报”，当时与“良友画报”齐名。“上海法学书局”于民国二十三年秋创立，专门出版有关法律的书籍。李公朴与艾思奇、柳湜等，于民国二十五年间主持“读书生活社”^⑫，出版“读书生活”半月刊，以

通俗的写法提供青年大众自学的新知识；并出版了多种左倾思想的书籍。姜君辰等主持“新知书店”^⑬，出版“新世纪半月刊”及各类左倾的新文化书籍。

国民政府方面，为了与左翼文化相对抗，于是由陈果夫、陈立夫等发动上海的八大教授组织了“中国文化建设协会”，以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为目的，出了一种“文化建设月刊”，由樊仲云主持，这是“新生命书局”停歇后国民政府所办最重要的杂志，内容重于反共的理论。同时，该协会并致力于推进读书运动，在各报出版类乎图书评论的读书周刊。

在南京方面，当一·二八时，中央大学的教授张其昀等主编了一种学术教育性的“国风半月刊”^⑭，其后扩大而成立“钟山书店”，尝出版过几种中学教科书。同时，杨公达也主编了一种讨论政治法律等问题的“时代评论”。但其后杨公达做了立法委员，该刊就停办了。纯由官办的，则有“拔提书店”^⑮，以出版军事书籍为主，殊不为外间所注意。在民国二十二年，由陈果夫、陈立夫、叶楚伦等主持创办了“正中书局”^⑯，这是民国以来最大的官办书局，除把“时事月报”和“中国文艺”月刊归其发行外，更出版“教与学”等杂志，计共有十余种。所出书籍，最初以中学及师范教科书为主，继乃旁及参考书和一般读物，于三、四年中出至千余种，而其中尤以蒋介石与宋美龄合著的“西安半月记”，传诵全国，销达百万册。又于民国二十二年，在孙科的主持下，成立了“中山文化教育馆”，除出版各种丛书外，尚有“时事类编”专载选译各国刊物上的重要文字，犹如（Living age）“期刊索引”“日报索引”等期刊，至翌年八月复出版专门学术性的“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”，内容都很精彩，而且颇为前进。

自民国二十一年起到民国二十六年秋事变前止，各种杂志，

时生时灭，但一般的趋势则是愈出愈多，估计全国比较重要的杂志有五六百种，总数达一千数百种。除在前面已经提及者不论外，综合性刊物尚有天津出版历史悠久的“国闻周报”^{①7}，北京出版胡适主编的“独立评论”（撰稿者如翁文灏、陈衡哲及潘光旦等等，都是大学教授及著名专家）。上海的“时代论坛”、（后改“时论”，“光明书局”出版）、“文化杂志”（神州国光社出版）、“世界文化”、“时代文化”、“新认识”、“人文月刊”、“国民评论”“大陆杂志”、“国讯”及广州的“万人月刊”、“中华杂志”等；通俗的大众读物，尚有“民众周报”（北京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，徐炳昶主持，至二卷四期起归上海“开明书店”经售），上海的“人言”周刊（第一出版社）、“通俗文化”、“大家看”及广州的“大众周刊”（金鹄书店）、“万人周报”（万人书店）等；青年读物尚有上海的“中国青年”“青年文化”、南京的“青春月刊”（拔提书店），广州的“大学生”，武昌的“现代青年”等，妇女读物尚有“女声”、“女青年”、“妇女画报”（均在上海）等；少年儿童读物尚有上海的初、中、高三级儿童杂志（儿童书局）、“儿童新闻”，及广州的“少年文艺”等；关于读书与出版者尚有上海的“读书与出版”（生活书店）、“读书俱乐部”（现代书店）、北平图书馆与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的两种“读书月刊”以及“商务”的出版界，“开明”的“出版月刊”，“乐华书店”的“出版消息”等；关于国际外交者，尚有“世界政治”（陈民耿脱离“时事月报”后主编，系国联同志会出版，内容极精湛），“国际导报”（苏联在上海的宣传刊物），“国际译报”（南京），“国际现象画报”（上海启智书局）以及“外交评论”（南京）、“外交月报”（北京）、“日本评论”等；关于经济者有“中行月刊”（中国银行）、“银行周报”、“商业月刊”等（都在上海）；关于社会者，有“社会导

报”、“劳工月刊”、“劳动季刊”等；关于政治者有“政治评论”（南京）、“现代政治”（上海）、“行政效率”等；关于教育学术者，有“教育研究”（广州中山大学）、“时代与教育”（中华教育建设协会）、“教育丛刊”等；关于科学者，有“科学画报”、“科学周刊”（上海）、“科学的中国”（南京）等；文艺性者尚有施蛰存办的“文饭小品”，戴望舒办的“新诗刊”、曹聚仁与徐懋庸合编的“芒种”（群众杂志公司出版），以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几种。

上海杂志公司^⑯系创立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。当时因读者购买力薄弱，单行本的新书出版不多，而杂志则因定价较廉，易于销售。而出版者且不限于书店，集合若干同人便可成立出版社，因此至为蓬勃。有“杂志年”之称。于是综合经售全国杂志的公司乃应运而生，此即张静庐独力创办的“上海杂志公司”。该公司将全国各地的新刊物汇集一处，公开陈列，任人翻阅，进一步并代理发行各种杂志，如留日学生所办的“质文”等计有十余种，同时其本身亦从事出版事业，刊行黄源主编专载译品的“译文”，孟十还主编的综合文艺月刊“作家”，黎烈文主编偏重杂文的“中流”半月刊，都是鲁迅系统的刊物，具有相当号召力，与“生活书店”出版的“文学”与“光明”等相并立。接着，该公司又出多种单行本，比较重要者有施蛰存校点的一套“中国文学珍本丛书”^⑰。

因上海杂志公司营业发达，于是跟着成立的有“群众杂志公司”，代理发行“夜莺”（只出四期）与“文学大众”（只出二期）等；但因规模既小经营又不佳，以致黯然无色。

自民国二十三年以后，单行本新书的出版日多；而杂志界的景况却并未衰落，仍在继续增加。不过，中国的民主制度尚未发达，过去书籍刊物之被禁以及书局之被封，已经是屡见不鲜。迨

民国二十五年时，因许多刊物，抗战意识浓厚，致被禁售者日有所闻。例如是年十二月中，尚有十四种杂志遭到政府当局查禁，其中计有“文季”月刊，“通俗文化”半月刊，“新认识”半月刊，“新世纪”半月刊，“青年文化”半月刊，“国际导报”，时论，“作家”月刊，“中流”半月刊，“生活星期”刊，“世界文化”，“读书生活”等。至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下旬，北平方面禁售的刊物达六十余种^{②9}。而有些书局，或因营业不佳，或因主持者故世而停闭者也不少，例如“光华书局”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清理，同年底“现代书局”亦告倒闭，至二十六年“民智书局”又复停歇，此外还有“群益书局”等。

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的“大公报”上载有一篇“上海航信”，其中记载着张静庐谈全国杂志的出版和外销的情形说：“据告在过去二个月里，杂志公司曾搜罗一千二百多种，除里面有五百多种是专门出的学术刊物和含有地方色彩的外，其余都是一般的读物”（这意思是说泛论中外时事政治经济情形及社会动态的，有讽刺的怒骂的，嬉笑的叙述和图画者）。这里有几种每期可销二、三万份，如国闻周报、东方杂志、世界知识、生活星期刊等；有几种每期可销一万多份，像论语（现在已没有这么多了）、读书生活、宇宙风、时代漫画、光明、中流、科学画报、新中华中学生等；其次是不及万的几十种，二、三千的几百种。……出版的地点……十分之五是在上海出版，十分之二是在南京北平十分之一，还有广州汉口香港四川天津等地合计十分之二。至于销场，除上海外，最大的主顾还在民族发扬地的广州、其次是北平和首都，四川近来有十分蓬勃的气象……。一九三四年的时候，所有的杂志多半是电影和一些无意识的漫画。到了去年（即一九三五年）这许多东西本身没有存在的能力，相继停刊，代替的是一些翻印的古书。到去年底，又产生出这最近

的许多一般刊物，这些刊物的应运而生，是跟着我们国家的建设及人民心理的进步成正比例的。……”^{②①}

由这一段话，我们可以约略窥一九三四至三六年期间中国出版界情形的大概。

从小书到大书

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，起初出版的书籍多着重于思想与文艺方面。迨五卅运动以后，各书局并致力于出版学校补充读物，如英汉对照的名著，新旧文学的选注，及史地社会科学的参考书等。到了一·二八前后，除“商务”“中华”与“世界”三大书局以外，如“北新书局”、“开明书店”、“中学生书店”、“钟山书店”、以及“正中书局”等，竞编中小学校教科书，因为此种书籍销行广大，获利较厚。“商务”与“世界”并出版大学丛书，从此各大学的教科书不必再用外国本子，而可以用中文本子，这不但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（因过去采用英文原版，书费甚昂），挽回国家的利源，并且中文本比较适合国情，阅读又较方便。

在这时期的中国出版界，还有几种趋势值得注意，兹分述如后：

第一是儿童少年读物的增加。在民国初年时，各书局已在竞译各国童话及演述古书中的故事，以供儿童阅读，但出版不多，亦且并无计划。至一·二八前后，北新书局除发行“小学生”半月刊外，并且出版了大批的小学生丛书。接着，在上海更有“新中国书店”的开办，也出版了许多少年和儿童的读物。后来又有“儿童书局”的成立，发行低、中、高三级“儿童杂志”，

并专门出版儿童图书。现代书局亦有“现代儿童”半月刊和供给儿童阅读的丛书出版。开明书店本以青年为对象的，这时也出版了“新少年”半月刊和许多少年阅读的书籍。“商务印书馆”本有“儿童世界”和“儿童画报”两种杂志，这时更出版了“小学生文库”五百册，“幼童文库”二百册。“中华书局”除“小朋友”半月刊外，继亦发行“少年周刊”并编印“中学生文库”三百册，“小朋友文库”四百五十册。“世界书局”亦出有“儿童文库”二百册。其他还有许多，不胜备述。

第二是参考工具书的增加。远在北伐告成以前，“商务印书馆”便有“第一回中国年鉴”的出版，其后更有“劳动年鉴”等，但似并未引起国人之注意。到了一·二八后，编印年鉴之风特盛^②，重要者有“时事月报”社编一九三一年由“大东书局”出版的“世界年鉴”（惜只一回）申报馆出版民国二十二、三、四、五年“申报年鉴”计共四册。还有二十三、四年“中国外交年鉴”二册，教育部编一九三四年由“开明书店”出版“中国第一回教育年鉴”一册，一九三二年“中国图书年鉴”二册，以及“中国文艺年鉴”（一九三三年系由“现代书局”出版，一九三四、五、六年系杨晋豪编北新书局出版）等多种。此外，“开明书店”并出版“辞通”“十三经索引”等。至于各种新辞典的出版，则为数更多了。

第三是翻印古书的盛行^③。“商务印书馆”于民国二十二年除出齐了“世界文库”外，并续出“百衲本二十四史”，全书计共八百册；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又出“四部丛刊”续编三编及四编；同年教育部于文渊阁藏“四库全书”中选定向未刊行之二百三十一一种交“商务”印行，分装二千册，又开始影印“宛委别藏”四十种；到了民国二十四年，复就历年访得之善本出书，择其尤者百部，成“丛书集成初编”，分装四千册，分期出版。

“中华书局”亦于民国二十三年起开始印刷“四部备要”计三百五十一一种，分订二千五百册；并将被称为中国百科全书的“古今图书集成”予以缩版影印，合订为八百册，分二年出齐。“开明书店”出有影印“二十五史”九册及其“补编”五册。“世界书局”也出版了许多国学丛书，把各种古书圈句影印，低价出售。“上海杂志公司”则把各种稀见的古代作品，辑印为“文学珍本丛书”。按中国的古书，或因售价太贵，或竟已成孤本，故流传不广，现经如此翻印，普及不少。

第四是整理资料的进行。例如“良友图书公司”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了一套赵家璧主编的“中国新文学大系”^②，分约胡适鲁迅茅盾朱自清郑振铎阿英等。编辑理论集、论战集、小说集、散文集、诗歌集和资料索引等十六巨册，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的结集。再如“生活书店”出版郑振铎主编的“世界文库”，把中外各国的世界文学名著汇集出版，可说也带有整理的性质。

最后是投机书籍的众多。除有若干落伍的书局专门出版低级趣味的庸俗小说，发行一折八扣的标准书，翻印改头换面的文学译著等外，更有许多“会考指导”“考试指南”“日文百日通”等等纷纷出版；这些书籍对于文化并无价值，不过是出版商人藉此牟利罢了。此外，在北京方面，更出版了三四百种的“翻版书”，把上海各书局所出销行较佳的书籍，大批翻印销售，内容校对错误，抑且妨害版权，此类书价，既无商业道德，抑且触犯法规，后经上海各受害书店联合对付，卒经破获，解由北京地方法院罚办，此风方得稍戢。这实是中国出版界上的一个污点。

在民国二十六年中日事变以前，是中国出版界最兴隆的时期，社会上对于精神粮食的需要既大，而文化人的工作亦极努力，并且白报纸价格每令只有法币三元，排工每千字只有五角，

成本既轻，出书自易。据“民国二十五年申报年鉴”根据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申报与大公报所刊广告统计，在一九三五年中全国出版的书籍，计有2404种，事实上未登这两报广告的新书还有不少，故不止此数。又据同书所载“全国报馆刊社调查统计表”，当时全国计有日刊912，间日刊27，三日刊78，四日刊1，五日刊16，周刊423，旬刊152，半月刊184，月刊591，二月刊20，季刊101，四月刊1，半年刊18，年刊11，不定期刊200；其中上海一地计有日刊57，三日刊4，周刊44，旬刊11，半月刊50，月刊144，二月刊7，季刊12，半年刊1，不定期刊39。又据调查，在民国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度）全中国出版书籍的总数计达9438种，其中“商务”占4938种，“中华”占1548种，“世界”占231种。再据杨晋豪编“一九三六年度中国文艺年鉴”所载，该年出版的重要文艺刊物有50余种，重要的文艺著译约500种。”当时中国出版界情况之盛，由此可见一斑了。

①录自杨寿清著《中国出版界简史》一书（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初版）的第三章《一·二八后出版界的倾向》。全书共分三章，其第一、二章章题分别为《古代中国的出版业》和《五四时代出版界的发展》，书末附有《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》。该是今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出版史。

作者杨寿清（1910—1993），原名杨晋豪，江苏奉贤（今属上海市）人。1933年曾进北新书局任编辑，建国后，1957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，1964年任该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副主任。有著译多种。

②日本“一·二八”侵华时，关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，可参见《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》（何炳松）一文，收入《中国出版史料·现代部分》第一卷下册第42—54页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。另有《为国难而牺牲，为文化而奋斗——抗日时期的商务印书馆》（张人凤）一文，原载《东方文化》1997年第3期，收入《商务印